

# 中华民族的精神吸引力

□郭文斌

百集大型纪录片《记住乡愁》第二季60集于2016年1月3日在央视国际中文频道每晚黄金时间播出,再度掀起乡愁热,从节目组进行的收视调查来看,海外观众反响尤为强烈。笔者以文字统筹和撰稿的身份深度参与了节目的采拍和制作,也多方面跟踪收集播出效应,深刻感受到节目的重大影响力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节目在成功实现了诸多预期价值之外,还收到不小的现实干预效果,为现代人走出迷茫感、焦虑感提供了许多新的出口。据笔者所知,有不少人进行了生活化复制和精神性借鉴。

大家普遍认为,节目以“关注古老村落状态,讲述中国乡土故事,重温世代相传祖训,寻找传统文化基因”为宗旨,展现了传统村落优美和谐的自然环境、布局合理的人文景观、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、独具特色的乡土风物、深沉丰厚的文化积淀,梳理了传统村落的历史发展脉络,通过传承千百年的村规民约、家风祖训,探索了民族文化的精髓,深入挖掘和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“讲仁爱、重民本、守诚信、崇正义、尚和合、求大同”的时代价值。

通过一出出宏伟、唯美、抒情、诗化的节目,人们惊叹,“乡愁”中居然蕴藏着如此巨大的生命力、和谐力、建设力,居然如此紧密地连着天地,连着先祖,连着岁月,也连着吉祥如意。它是生机、是春意、是真理在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庄稼,是四两拨千斤的“四两”,是万变不离其宗的那个“宗”,是“君子务本,本立而道生”的那个“本”。

一个家族能够传承千年,其历史跨度超过许多民族、许多国家;一个族谱能够保留千年,无论是战乱还是瘟疫,都未能让它从大地上消失;一个村落能够成为状元村、翰林村、将军村、长寿村,能够几百年来没有刑事犯罪,能够做到路不拾遗,夜不闭户,充分证明了其文化逻辑的先进性。

一个受过重伤的人,最重要的是恢复元气。当下社会,各种危机困扰着人们,说一千道一万,其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恢复这些隐藏在人民之中、深埋在岁月深处的原始生命力。它让我们反思,要想降低社会治理成本,就要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技术管理层面,回归到四两拨千金的文化管理层面。为此,《记住乡愁》的拍摄,价值不可估量。传统文化式微几百年,断代一百年,后果大家都看得清楚。如何恢复传统,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。近年来悄然兴起的经典诵读、公益论坛,包括陆续出台的许多制度性措施,都是值得肯定的方式,但如果不化为人们的生活方式、工作方式、伦理方式,依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许多高学历的人日子过得很糟糕,而一些大字不识的老太太,不但自己活得幸福,还可以把一个家庭管理得井然有序。可见,知识不能代替智慧,学习不能代替行动,智慧主导下的行动力才是最关键的。在《记住乡愁》第一季60集中我们看到,支持这种行动力的首先是天地敬畏、祖宗信仰、德性建设,还有像生命本身一样重要的文化传承硬件:祠堂、族谱、书院、私塾、戏园、公共建筑,以及族规家训、节日、祭礼、婚礼、葬礼、寿礼、开蒙礼、成年礼等物件。

这些物质平台和精神链条,让人们有了一种建立在对生命清晰认识之上的道德自觉和责任自觉,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责任担当和超越性生命姿态,让人们普遍有一种“学做好人”的冲动;激发爱心、培养爱力、形成爱行,增长学识、增加见识、增强胆识,成为永恒的成长主题;幼儿养性、童蒙养正、少儿养志、成人养德、老人养慧,成为永恒的生命历法。

看过节目的观众一定会惊叹:

这个世界上,曾经有一种生活,是那么自足、自在、自得、自由、潇洒、浪漫、诗意、喜悦、幸福、圆满,但成本却低得只需要一片土地就足矣,甚至只需要一个好心情。这个民族,它不单单追求法律意义上的社会成就,更追求心灵意义上的生命成就,它甚至追求要在起心动念处享受生命,超越生命,完成生命能量的管理和应用,它懂得在出发地就享受生命和生活之大美,而不是一定要到远方,取得多么大的成果,甚至不惜以伤害他人为

代价。一句话,这是一个懂得并善于以最低成本享受最大幸福的民族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记住乡愁,不但是华人之福,更是人类之福,不仅是中国梦,更是人类梦的一个模型。

第二季对第一季既有精神性延续,又有深化和拓展。如果说第一季更多地表现在“厚德载物”,第二季则突出了“自强不息”。

比如被称为“绝壁上的村庄”的河南郭亮村民,他们不惜一切代价,甚至流血牺牲,最终在无比险峻的悬崖绝壁上开凿出长达1250米的绝壁长廊“郭亮洞”。被外界誉为“世界最险要的十条路”之一、“世界第九大奇迹”的“郭亮洞”,向世人讲述了一个感天动地的新时代愚公故事;接着,他们又修成远近闻名的“好汉梯”;相继,又在绝壁上建起公共观光台和高端农家乐“崖上人家”;与此同时,不少后生走出郭亮村,漂洋过海,把郭亮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带向世界。

在新疆赛罕托海村,土尔扈特人东归的壮举可谓荡气回肠,漫漫长途让17万人回到故乡后仅余7万,其所表现出来的家国情怀,让人唏嘘。当他们终于回到根脉相连的大草原之后,对草原的热爱和保护,同样让人动容。而海南草塘村人守护祖宗海的故事,有着相似的感人力量。沉浸在具有同样精神气质的故事中,“故土”一词有了格外的温度。不禁想:这海洋何尝不是南国的草原,这草原又何尝不是北国的海洋,它们是亲兄弟。

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,见诸福建塘东村、安徽许村、广东沙溪村。

对“自强不息”,通常的解释是“自觉努力进取,不懈怠,不停止”。而早见于《周易》中的“自强不息”则是“天行健”大前提下“君子”的理想生命状态。为此,在我看来,这个“自强不息”,正是“天行健”精神的人格化,或者说,是“天行健”气质的人间投影。由此,“自强不息”还可理解为:因为“自强”,所以“不息”。而“自强”又可以理解为因为“自”所以“强”。这个“自”,是本来、根本、本体。在中国人看来,根是源头性、整体性、自然性,体现在心念上就是通过有分别的亲爱训练和较少分别的兼爱实践,到达无分别的大爱。

这种没有分别的大爱,充溢在第二季的节目中。

在福建廉村,我们看到,廉洁已经成为一种生活风尚,一种生命审美。在其族谱中,有这样的规定:贪污者除名,不得埋入故土。贪污正是因为私心所致,而私心来自爱的分别,当一个人的爱扩展到没有人我分别时,贪欲就会自动脱落,既然你就是我就是你,就没有必要把别人的东西设法归于己有了。

在西藏吞达村,人们在耕种时要给牛系上鲜艳的布条,挂上铃铛,让田里的小动物们看到听到,然后早早离开,以免被伤着。在江西旺口村,为了保护大自然,父亲能够大义灭亲。在四川宝胜村,人们可以义无反顾地跳进充满毒气的窑里救人。在北京慈母村、潮州沙溪村、安徽里仁村、安徽许村,洋溢着一种大同世界的味道。在宁夏南长滩,一家人去世了,全村人都要停下农活投入 to 丧事中,即便是抢救时节。在宁夏单家集,回汉亲如一家人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在云南芒景村,一位名叫女江的女性能够为抛弃她另找新欢的前夫举行体面的葬礼,这是典型的以德报怨,更让人感动的是,她现在的丈夫十分愉快地支持她完成了这个高难度生命动作。在已经习惯了以牙还牙的社会,这似乎有些不好理解,但是在女江心里,这却是她“应该做的”,在她的表述中,我们听不到多少豪言壮语,但我又分明“听到”有无数的古圣先贤,都站在她身后为之集体做注:只有以德报怨,才能从冤冤相报的仇恨之河上岸,才能让报复性生命悲剧当下终结,而只有仇恨当下终结,喜悦才能到来,否则,来自生命本体的快乐将被仇恨遮挡。想想看,当一个人把心里的仇恨清理出去,那该是一种怎样的欢畅。就是说,以德报怨,受益的首先是自己。另一方面,在以德报怨者看来,生命是一个投影,如果我们的旧记忆中没有灾难性底片,生活中的伤害是不会发生的,伤害我们的对方,事实上是我们自己的心灵投影。现在,我以德报怨,

## 时光煮文甘苦味之

——读童庆炳先生《旧梦与远山》 □赵 新

于对这种“真实人生”的理性揭示与感性呈现,在其美学随笔《苦日子甜日子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)的序言中说:“散文是人的灵魂的微笑,一定要真情实感。没有真情实感,灵魂就微笑不起来。”“真情实感”就需要能将自己灵魂深处的所思所想“大无畏”地呈现出来,童老从“甘甜相伴”“甘甜互渗”的人生经验里提炼出一种活泼平实的美学体验或散文风格,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字技巧与叙述手段,更是一种清明心态与人生洞悟。

“甘甜互渗”是一根贯穿童庆炳散文集的精神红线,也是他散文创作成功的一大法门。散文集中处处弥漫着浓郁的“乡愁”,童庆炳笔下的故乡之美,使人读来如同在时间的光阴里游泳的感觉:在陕西的一处深山幽谷之中,在一片阳光世界里,鲜花簇簇、流水悠悠、古潭咚咚、田稻穰穰、远山默默……所以,童庆炳说我的故乡就是我的风景。是啊,春风春水长养好花,人不仅仅是生在一己六尺之躯的内体里,也要生在花里、水里、山里,生在一切美好的事物里。“大美而无

言”、“至乐而无声”,童庆炳记忆中的故乡永远是那么的纯净澄澈、妩媚动人。而童庆炳笔锋转折之处,也让我们看到童年家庭的饥饿、生活的困顿、上山砍柴挑柴的辛苦以及“两个女人加半个男人”谋生度日的故事,读来令人潸然泪下。许多散文的故事也就在这种亦苦亦乐、一张一弛的叙事格调中平静而幽缓地讲述着。聪明生于志气,青壮年时期的童老如万千中华儿女实现了“志在四方”的梦想,首先是离开了家,然后离开乡,再离开省,甚至又曾经长期离开了国。几十年以来,童庆炳正是在这种不断变幻的日月山川里干事业与过光景,于是也就发生了一件件故事,说不完,道不尽。散文集首篇《远山》说:“我到过很多地方,见过许多奇奇怪怪的人与事,欣赏过美丽的古怪的景与物……我敢说,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已经裸露在我的面前。可这一切如同过眼烟云,从未在我梦中出现过。然而,在我的意识里,故乡的远山为我保留着令人神往的永久的神秘。”数千年以来,对于祖宗父母亲族的感念、对于乡土乡音的热爱、对于故土风物人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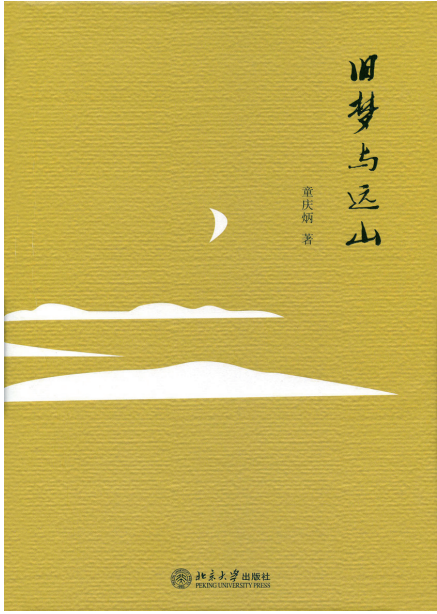
本身就是清理我的旧记忆,也就是净化灵魂,仍然是自己先受益。更为重要的是,在智者看来,事情的成败固然重要,但心灵的成败更重要,如果一件事情成功了,但心灵的高度降低了,仍然不算成功。智者永远把来到生命中的每件事情作为提高心灵质量的机会,所谓“历事炼心”。当一个人能够以德报怨时,说明他的心灵已经宽广到可以把仇恨忽略不计,也说明他的心里已经没有人我分别,而一个没有人我分别的心灵,显然已在天地频率,已经可以归根复命了。

浙江东明村里来谦的一句话,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自强不息的次第。他把人分为“三品”：“三品追求富贵,二品追求功名,一品追求道德。”为此,在这个村子里上演了郑氏义门300多年15世同居3000多人同食的“自强”大戏。从中,也让我们明白,没有载物之厚德,就很难有不息之自强。自强需要生命力做保障,而生命力正是厚德之根开出的花朵。换句话说,“二品”“三品”不过是“一品”的派生物而已。正如《大学》所说:“有德此有人,有人此有土,有土此有财,有财此有用。”可见最有效的自强,就是找到这个作为根本的“自”,它就是《大学》开篇讲的“明明德”。如何“明”这个“明德”?换句话说,如何“强”这个“自”?在我看来,有三个极为重要的方面:一是教育。《礼记》有言,“建国君民,教育为先”。在第二季,有许多村落都极其崇文重教,比如广西金塘村、江苏陆巷村、云南喜洲村、福建兴贤村、河南张店村、广东歇马村、福建洪坑村、湖北鱼木村。崇什么文,重什么教,究其实,都是为了“明明德”,因为只有“明明德”,才能实现“亲民”,才能“止于至善”,才能实现没有分别的大爱,这个没有分别的大爱,既是现实生活的保证,更是生命的终极意义所在。

二是谦德。《周易》八八六十四卦,卦卦有吉有凶,只有谦卦全吉,那就是说,只有谦德能够保持永恒生机。一个人,当他谦到极处时,其德自明,其功自成。正是这种谦德,让浙江三门源村叶瓮两家情同手足、永修睦好,让云南芒景村、勐景来村人心平和、温和处事,让广西金秀瑶寨、福建浦源村人敬爱自然、珍爱家园。在浙江三门源村,叶瓮两家有一种神圣意味的谦让,让两家人即使偶有矛盾,也能很快化解。在浙江勐景来村,人们有一个条件反射性的表达:“苏玛”,意即“对不起”,正是这个习惯性的集体无意识,让人们始终处在谦态,从而让家庭和乐邻里和睦。尤其让人感动的是,在宁夏单家集,回汉两族像守护自己的眼睛似的守护着友好,其情景,催人泪下。以上是狭义的谦德范例。广义地讲,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等一切美德都可归到谦德门下。

三是诚信。诚信也是谦德,在此之所以单独列出来,是因为它太重要了,因为生命的意义无非在于提高生命力,而要提高生命力,则百术不如一诚。《中庸》讲:“唯天下至诚,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,立天下之大本,知天地之化育。”这一点,我们在广西罗凤村、湖北羊楼洞村、江西汪口村看到了实证。特别是广西罗凤村的无人售票市场,如果不是媒体实地采拍,人们很难相信那是真的。它是一百多年前自发形成的。农忙时节,无暇看守菜摊的村民想出了一个办法,把写好价钱的小纸牌绑在菜筐上,再系上一个供人放钱的小竹筐,便离去做事,忙完回来,发现买菜的人竟然心领神会,拿走了菜,留下了钱,且数量刚好。之后,越来越多的村民效仿这一做法,逐渐形成了无人售票的习俗。斗转星移,岁月更替,一百多年过去,无人售票的习俗至今未变。让人称奇的是,一百多年来,无人售票市场竟然没有丢过一把菜少过一分钱,“不怕人家不给钱,但是人家也不会不给钱。”这句话值得重视,因为信任,所以守信。首先是信任,其次才是守信。信任是感,守信是应。这样的诚信盛况,一定有一个强大的信仰力量在支持。

在这个雾霾常常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季节,这样的节目,已经具有了心理干预的效果,它们就像一簇簇向岁月和大地报春的花朵,沁人心脾。无疑,这是中华大地的元气,也是中华民族的福气。



的依恋,这种人心人情是万古千秋不会变的。由此,我们更容易理解,当晚年的童庆炳再见昔日梦中的故乡经过“山水之殇”已经“面目全非”的时候,那种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的呼唤、悲伤与无助真正变成了一种揪心的痛。当人们说散文创作要做到所谓“形散而神不散”,这“神”是否已经蕴蓄在创作者自身存有的那份稳定而持久的胸襟、情怀或人格格局之中呢?童老对“乡愁”的追忆与感念,使我信哉斯言!

“笑问兰花何处生,兰花生处路难行。争朝爆竹抽花朵,泥手赠来别有情。”这首绝句的作者,是20世纪早期著名的湖畔诗人应修人。他的新诗《妹妹你是水》《小小儿的请求》等流布颇广。他的旧体诗词的光芒,往往为他的新诗成就所遮蔽。

像应修人这样的旧体诗词作者,在20世纪灿如繁星。不少写新诗名世的诗人,也都是一些优秀的鲜为人知的旧体诗词作品。只是因为他们新诗方面的盛名,这些旧体诗被掩盖了。比如徐志摩这首《清明雨中》:“檐溜潺潺插柳斜,异乡佳节不须夸。暂时为客还非客,此日离家总忆家。听雨有愁宜中酒,寻春无梦到看花。隔墙薄暮新烟起,暗减心情负岁华。”诗中描写了杭州清明雨中的感悟,表达了思乡和少年特有的一种透明的怅惘。语浅情长,辞美味醇。再比如闻一多这首《废旧诗六年矣,复理铅笔,纪以绝句》:“六载观摩傍九夷,吟成姑舌总猜疑。唐贤读破三千纸,勒马回缰作旧诗。”其中的“勒马回缰作旧诗”,成为一个颇富象征意义的时代意象,令人品味再三。

这些诗词作者数量纷繁,面目各异。他们写作旧体诗大多不是为了发表,不是端着诗人的架子作抒情状,而是随感而发,触景生情,随意挥洒,所以更加接近生命的本色,更加容易保留岁月和历史的原生态样貌,更能折射这一特定时期的诗人心态和社会细节。这些作品有诗的魅力,同时也有史的质素。

梁启超先生在《二十世纪太平洋歌》中说:“胸中万千块垒突兀起,斗酒倾尽荡气回中肠……太平洋,太平洋,君之面兮锦绣壤,君之背兮修罗场……”清末民初正是所谓3000年未有之大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,诗词的多元流派和多元生态,折射出了这个时代变革的复杂性和特殊性。接踵而来的20世纪诸多历史事件,恰好为这些悲剧、喜剧、壮剧、惨剧做了详细的注脚,一个社会大事件给诗词作者带来各种各样的心理冲击,也为形形色色的作者搭建了新鲜的性灵舞台。他们的诗词作品是时代变迁的活的精神标本,寻找他们失踪了的轨迹和光芒,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一段段时间的背影和风雨的痕迹。

我对20世纪诗词的关注,先是源于上世纪80年代对郁达夫诗词的喜爱,而后则是因为对大学里的老师许桂良、顾之京夫妇的父亲顾随先生的敬重。我还记得在大学图书馆里借到郁达夫诗词选之后的惊喜——“曾因酒醉鞭名马,生怕情多累美人”等等诗句,就像楔子一样直接楔在我的心上。之所以用到“惊喜”这个词,是因为此前我竟然没有注意到过,在我的阅读视野之外,还有这样一种又新又旧、新旧难分、魅力无穷的文学存在。

五四以来,新诗虽然在主流文学界有了重要的地位,但其自身的某些缺陷所导致的争议也是一路相伴而来。鲁迅在1934年致窦隐夫的信中就曾说过:“没有节调,没有韵,它唱不来;唱不来,就记不住;记不住,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,占了它的地位。”此后至今已经整整80年了,尽管旧诗仍然没有从人们的脑子里被“挤出”,但旧诗被主流文学界所忽视甚至说歧视,也仍然是客观的文学现实——除了引起广泛聚焦的少数领袖和社会名人的作品之外,很少有研究者关注20世纪旧体诗词的整体创作成绩。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,也是和20世纪旧体诗词的创作水平和美学影响不相称的。

诗歌与时代有着天然的联系,事实上从20世纪诗词中我们能够真切地接收到时代前进的神秘聲音。请来看袁克文的“绝岭高处多风雨,莫到琼楼最上层”,这两句表面是写游颐和园的感受,抒发了淡泊功名、不贪恋权势的明智的人生态度,实则曲折表达了对父亲袁世凯的劝谏和讽喻。再请看张恨水写南京大屠杀的这两句:“城里遗民三十万,可能一哭似予无?”其笔调沉郁苍凉,凄清苦涩,读来如在昨天,让人怦然心动。还请看张大千写乡愁的这两句:“半世江南图画里,而今能画不能归!”因为战乱阻隔,作者漂泊海外,不能归国,画梅杏而思江南,感叹只能画却归不得。词调明丽,而心境悲凉。下面再来看看沈祖棻笔下的春愁:“三月莺花谁作贼?一天风絮独登楼。有斜阳处有春愁。”这句“有斜阳处有春愁”使沈祖棻赢得“沈斜阳”的别号。这首词写于1932年,表现的即是踏青引发的春愁,实际还有隐含着“九一八”事变后国人对山河破碎的家国之忧,已经远甚于一己幽怨了。

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,也能在旧体诗词中辨认出清晰的雪泥鸿爪。罗元贞说:“老去孤怀天不问,生来野性自难驯。”冒效鲁说:“说法能为狮象吼,违时休作鸟虫吟。”张伯驹在这首《浣溪沙》中说:“病酒愿为千日醉,看花误惹一身香,老年狂似少年狂。”林散之则在这首《七零年八月初三夜》中说:“江上青留点点山,别来无恙在人间。”一句“别来无恙在人间”,依稀让我们感受到平静水波之下的内心湍流。

聂绀弩的《惊闻海燕之后自赠》是一首特殊年代的奇异的爱情诗:“愿君越老越年轻,路越崎岖越坦平。膝下全虚空母爱,心中不痛当人情。方今世面多风雨,何止一家撼珊瑚?稀古饭翁相慰乐,非嫫非寡且偕行。”作者服刑后获释,却惊闻爱女海燕早已自杀,随后写了这首七律送给老伴。全诗泪中含笑,笑中含泪。写的是家事,而从“方今世面多风雨,何止一家撼珊瑚”这样的诗句,又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悲剧性的记忆。全诗单挑出一句来很平常,但组合到一起,却成为一个强大的气场,有震撼人心的千钧之力。

以上例举,仅仅沧海一粟。实际上,20世纪有不少非常优秀的诗词佳作,但大多在读者中并没有达到耳熟能详、广为流传的程度。因为对其缺少文本意义上的理论研究和有效的媒介传播,致使这些诗词作品在公众视野中处于一个边缘化的尴尬境地。

我理解的诗歌写作是一种艰苦的人生体验,需要最大限度地逼近人生,最深度地体验人生。20世纪诗词决不仅仅是词藻层面的、技术层面的,而是生活化的、开拓型的、建设性的。不仅旧体诗词作者中的很多人,公众并不一定把他们当作诗人来看。但是他们自己对诗人的身份却似乎看的十分重要。比如据周晓川先生回忆,词学家夏承焘先生临终之时,嘱咐身边亲故:“我过老时你们不要哭,在耳边哼这首诗就可以了。”意思是说不要哭哭啼啼,只要吟诵他写的《浪淘沙·过七里泷》就可以了:“万象挂空明,短篷啼遍过江城。可惜层楼无铁笛,负我诗成……”这首词作于1927年,写夜过富春江七里泷的感受,月下泛舟,秋光奇绝,仿佛徐徐展开一幅淡雅的山水画,深入浅出,余韵悠悠。

罗癭公先生告诉程砚秋,死后墓碑只写“诗人罗癭公之墓”七字。钟敬文先生也有类似的遗言。书画名家林散之先生自题的墓志铭上,也只有几个字:诗人林散之墓。罗先生的书法造诣很高,钟先生在民间文学界是权威,林先生的诗名也远不及他的书画名之盛,他们回首平生,为什么只提自己的诗歌呢?倘若这些传说无误的话,我相信罗、钟、林诸先生肯定是把“诗人”这两个字看作了美好人生的象征。不凡的人生旅程,自然是有着多姿多姿的两种内容,而他们自己则以一言以蔽之,曰:“诗人。”人是诗之本,诗是人之光。“诗人”是个美好的称号。其美在诗,其美更在人。

旧体诗词从复苏走向复兴,从复兴走向振兴,是21世纪令人欣喜的文学新潮。旧体诗词简练、凝重、典雅,把汉语的声韵美、形式美推向了极致,是汉语文学中最美丽的艺术花朵。文脉绵长,福泽深远,既是民族智慧的美好载体,又是文明传承的优秀媒介。诗词写作的重现或曰回归,并不是对既往新诗写作的简单否定,而是有益的调节和科学的补充。诗词新潮早已超越单纯的文体回归话题,而更具有了一种别具风姿的传统文化的象征意义。回眸20世纪的旧体诗词,研究20世纪的诗词演变和美学嬗变,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历史细节和生态原态,可以呈现当时的社会心理与精神生态的真实状况,可以为21世纪的诗歌发展提供有益的艺术借鉴和历史经验。美国评论家丹尼尔·霍夫曼在《美国当代诗歌史》中说:“诗歌,是一个民族的感情气候。”是的,20世纪的旧体诗词,所呈现和记录的正是这100年来我们民族的感情气候。其中有晴空万里,有艳阳高照,有雾霾交加,有风雨雷电……

# 人是诗之本 诗是人之光

□高 昌